

“折柳寄情”传递中华文化

□ 嵇立平

2月20日，冬奥会闭幕式在北京国家体育场鸟巢隆重举行，美轮美奂的表演吸引了全球人们的眼球。

在闭幕式上的表演中，有一个环节是“折柳寄情”。“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伴随着经典名曲《送别》的悠扬旋律，80名舞蹈演员在光影的衬托下，展现出一条条绿色的柳枝，随后365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手持发光的柳枝围拢过来，代表了一年365天的思念，表现出“惜别冬奥”的场景，这一幕独特的中国式的浪漫演绎，令人感动泪目。

我国植柳不晚于周朝

柳树是我国的原生树种，也是我国人工栽培最早、分布范围最广的植物之一。殷商时期的甲骨卜辞中就有“柳”的象形文字。我国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中有“折柳樊圃”之诗句，即指折下柳枝围成篱笆。

我国人工种植柳树的记载最早见于周朝文献《古微书·礼纬·稽命征》，文中载：春秋时期“庶人无坟，树以杨柳”，是说平民

百姓无坟墓，仅在埋葬地种植杨柳树。可见我国人工种植柳树最迟不晚于周代，在春秋战国时期得到较大的发展。

由于植柳不仅可以防风固沙、护路卫堤、遮阴造景、获取木材，而且易种易活，随处而安，所以自春秋及至近现代，我国植柳之风长盛不衰，遍布大江南北，也屡屡见于历代的文献、典故之中。

汉代后，柳树被引植到皇家宫廷苑囿中。据载，汉昭帝时著名的园林上林苑和汉梁孝王忘忧之馆中，都种植有大柳树。西汉名将周亚夫在军营中密植柳树，即历史上著名的“细柳营”。东晋诗人陶渊明爱柳成癖，归隐之后在自家房前亲植五棵柳树，自号“五柳先生”。北魏时著名农学家贾思勰在《齐民要术》中，更对历代植柳经验技术进行了系统总结。唐代诗人柳宗元在任柳州刺史时，在江岸广栽柳树，写有“柳州柳刺史，种树柳江边”之诗，博得了“柳柳州”的称号。清代名将左宗棠任陕甘总督期间，令军队百姓沿河西走廊六百里种柳，“新栽杨柳三千里，引得春风度玉关”，被人称为“左公柳”。

折柳文化的寓意

在我国古代文化中，“折柳”一词富含“惜别怀远”之意，折柳送别的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因“柳”与“留”谐音，离别赠柳可以表达挽留之意和依依惜别之情，所以在我国的古代，亲朋好友长期分离时，送行者常要折一支柳条赠给远行者。

最早以“杨柳”来寄托怀家恋土之情的，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里的《小雅·采薇》：“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说的就是一个旅人回想当初离家时，杨柳依依随风飘；如今思念归家时，大雪纷纷满天飞。诗句像一幅画，把他在漂泊苦旅中的思乡之情表达得淋漓尽致。而“折柳”一词最早出现在北朝乐府《鼓角横吹曲》的《折杨柳》中：“上马不捉鞭，反拗杨柳枝。下马吹横笛，愁杀行客人。”说的是郎君上马后不是取马鞭，而是反身去折杨柳。下马吹起横笛，撩起送行人惆怅的离情别绪。

唐朝时，京城长安近郊的灞桥两岸，十里长堤，一步一柳，凡送别亲朋好友东



2月20日，北京冬奥会闭幕式上“折柳寄情”环节。新华社记者 李凇 摄

去的人多到此地分手，并折下桥头柳枝相赠。时间长了，“灞桥折柳”便成了送别的习惯。李白的诗：“年年柳色，灞陵伤别。”和白居易的诗《青门柳》：“近都门多送别，长条折尽减春风。”说的就是这个风俗。

“折柳”一词也富含“怀远”之意。人们在思念亲人、怀念故友时也会折柳寄情。唐代诗人张九龄有写有诗《折杨柳》：“纤纤折杨柳，持此寄情人。一枝何足贵，怜是故

园春。”说的是一位女子折下纤细的杨柳枝，用来寄给远方的郎君，虽然一枝杨柳并不贵重，但它代表了家乡的春天和自己的相思之情。

《折柳寄情》的表演，向世人传递了中华传统文化的“惜别怀远”之情，让我们与参加冬奥会的各国友人“今宵离别后，一起向未来！”

（作者为中国科普作家协会会员、北京作家协会会员）

体育科幻小说诠释奥林匹克精神

——评《光荣与梦想》

□ 魏然

这是一本少见的关于竞技体育的科幻故事集。

竞技体育的直接目的是赢。当然，以奥林匹克格言“更高、更快、更强、更团结”为例，体育的内容是丰富的，输赢只是其中的一部分。而在科幻作品中，体育的内涵被再次大大拓展。它不仅是一种向上的精神所在，更凝聚了家国之梦，掺杂了科技与历史，绽放着光荣与梦想。书中来自于不同时代、不同作者的故事，正是这样将体育的灵魂延伸到了时空的不同维度，又将它们联结起来，让体育同人类文明交织在一起。

《光荣与梦想》是这本故事集中的书名同题文章，作者刘慈欣。但与大家所熟知的《三体》《流浪地球》等作品不同，《光荣与梦想》并没采用他所擅长的硬科幻风格。文中不再有炫酷的科技和深邃的星辰，转而讲述了一个凄美故事中的的人性光辉。在这个以北京2008年奥运会为背景的故事中，人类第一次试图以体育比赛替代战争。主人公是一个柔弱的女孩，也是一个梦想参加奥运会的长跑天才。然而梦想实现得如此残酷。在奥运会上她孤身一人，代表自己饱经战乱的国家，与完美后勤保障下的美国运动员竞赛马拉松项目。



她的胜与败，意味着祖国的存或亡。然而，这是一场无法取胜的比赛，女孩超越了身体极限，作为败者依然冲过终点，含笑而逝，一个似乎更加文明的世界吞噬了她的生命。

家国与梦想，战争与和平，都超越了体育的意象，但在情节中又附着在体育之

上，让这些抽象的现代性符号与人类原始的肢体运动合而为一。生命与祖国哪个更重要，恐怕没有简单的答案。是生命么？毫无尊严的亡国奴不知是否还堪称生命。是祖国么？倘若生命都不存在了，祖国又是谁的祖国。作品中类似的问题还有很多——综合性竞技体育比拼的是背后的综合国力，但体育能否替代战争？曾背负我，危难之际，我又应否救国？为了赢，去参加一场比赛甚至是必死的比赛，是否值得？比赛的意义又在哪儿？如此诸般，让人读罢不免掩卷良久。此外，作品中对空场进行的奥运比赛的描写，对人群和运动员刻意保持距离的描写，虽然都是情节需要，却像极了疫情之下取消观众的东京奥运会和闭环管理的北京冬奥会，而作品写作于近二十年前，令人称奇。

另一篇作品《豹》则来自王晋康，故事背景是雅典2004年奥运会。将猎豹基因引入人体的实验以悲剧告终，带走几条鲜活生命的同时，也带来了更多的问题。人和动物是否存在界限；人性和生存如果只能择一，该舍弃哪个；奥林匹克所追求的更快更高更强，不可不择手段，但边界又在哪里……开放性的结局让这些问题只能留给读者去解决，让作品远远超出了本身的篇

幅，也超出了体育的范畴，其中对于奥林匹克精神的求索，对于不同人种体育竞技先天优劣的探讨，对于基因编辑伦理的思辨，即便在作品诞生二十余年后的今天，依然毫不过时。

书中作品尽管都以体育为背景，题材却异彩纷呈，写作时间跨越60年。有描述科技进步的《3号游泳选手的秘密》，有呈现异文明的《梦绕地心》和呈现异空间的《647号公路》，有找寻自我的《野兽拳击》，还有同《光荣与梦想》共享设定的《负限奥运会》，后者以一种略带戏谑的方式向前者致敬。这些故事在讲体育，又不停在讲体育，它们在讲科学，讲尊严，讲生存的意志。

2022年冬奥会已落下帷幕。北京作为“双奥之城”，奥运虽已远去，但奥林匹克精神长存。体育是一种文化，也是一种生活的方式，为我们提供了无限的想象空间与思维可能。也许我们成不了运动员，也写不出精彩的体育科幻小说，但这并不妨碍我们在各自的赛道上挑战极限，突破自我，成就心中的奥林匹克。

（作者系北京2008年奥运会、北京2022年冬奥会“双奥”志愿者）



2月8日，法国选手亚当·萧因法在男子单人短节目比赛中。（图片来源《体坛周报》）

从机器人打理的厨房和餐厅，到虚拟数字主持人，人们在享受冬奥的同时，也感受到北京冬奥会上无处不在的科幻元素。因此当花样滑冰的赛场上响起系列科幻电影《星球大战》的音乐和音效，丝毫不令人感到意外。

采用《星球大战》配乐，是法国花样滑冰选手萧因法。在2月8日进行的短节目中比赛中，他的表演在《星球大战》系列中高人气角色黑勋爵达斯·维达标志性的呼吸声中开场，在开启光剑的音效中结束。

配乐对花样滑冰的作用毋庸置疑，它被称为花样滑冰的灵魂。当音乐的感染力和运动员高超技巧的感染力结合在一起，才会给人们带来最为强烈的艺术冲击。

花样滑冰这项运动起源很早，然而直到1932年的冬奥会上才开始有了配乐。不过那时的配乐是由乐队在现场演奏的，选手不能选择曲子，乐队从头到尾单曲循环。

后来配乐越来越重要，编排上也越来越讲究。多年以来，花样滑冰的配乐以古典音乐、歌剧音乐为主，《卡门》《歌剧魅影》是冰场上的常客。不过近年来，电影大片中的音乐越来越受选手们青睐，《星球大战》更是出现在了冬奥会的赛场上。

《星球大战》系列电影的第一部是1977年上映的，最近的一部则上映于2019年，横跨了四十多年。它的影迷众多，是世界流行文化中的重要元素。这个系列讲述的是在一个虚构的银河系中，一群理想主义者绝地武士与邪恶的帝国斗争的故事。而达斯·维达这个人，从绝地武士堕落成邪恶帝国的打手，而在生命最后时刻又实现了救赎，亲手消灭邪恶帝国，回到了绝地武士的队伍，他的经历贯穿了《星球大战》前传和正传叙述的银河史。他曾因受重伤不得不终生使用辅助设备呼吸，他的呼吸声沉重充满压迫感，往往不见其人，先闻其呼吸，成了《星球大战》系列的标志性元素之一。

当他的呼吸声在冰场响起，观众马上知道这段表演是《星球大战》的主题。萧因法采用的配乐中，既有绝地武士作战时激昂、庄重的音乐，也有黑勋爵等反派人物出场时常用的帝国交响曲，还有义军崛起时充满希望的旋律，很好地演绎了这部银河史诗。

而在表演结束时开启的光剑，则是绝地武士和邪恶的西斯武士都会使用的武器。听到这个声音，往往意味着即将发生精彩、激烈的格斗。萧因法的表演在这里结束，给观众留下了想像、期待的空间。

当然，这不是科幻电影的音乐第一次出现在花滑赛场上。今年的赛事中，意大利选手选用了《星际穿越》的音乐，阿塞拜疆选手选用了《小丑》的音乐，以及同样是在北京冬奥会花样滑冰比赛上，还出现了《阿凡达》的音乐。

时代总是在发展，人们的兴趣点总是在不断演变。相信将来随着更多的00后甚至10后运动员登上花滑的赛场，受到他们喜爱的科幻电影的音乐会越来越多。

（作者系科幻作家，中国科普作家协会会员）

严济慈暗中推荐他到居里实验室深造

——忆爷爷与杨承宗的六十年情谊（上）

□ 严慧英

慧语念慈

为了写《爷爷与居里夫人的情谊》一文，我查阅资料，看到了著名放射化学家杨承宗先生的一篇回忆短文《高山仰止》（载《东阳文史资料选辑》第十四辑，第27—28页，1998年）。文中提到一件事，是我此前所不知道的。

1946年初夏，年轻的杨承宗意外收到巴黎大学居里实验室的邀请函，前往学习。1951年杨承宗学成回国，投身于开创新中国放射化学的崇高事业。多年后，杨承宗才得知，当年自己“能以法国科研中心公费去法，乃严先生发起向伊·约里奥-居里夫人推荐”，但“慕光先生从不向我直接提起此事”。（见《高山仰止》）慕光先生就是我的爷爷严济慈。杨承宗先生是新中国放射化学奠基人，被公认为我国研制“两弹一星”中“没有勋章的功臣”，也是中国科技大学建校元勋、副校长，以及放射化学和辐射化学系首任系主任。这件事让我感动，也让我好奇。

杨承宗，1911年9月5日出生在江苏省吴江县（今苏州市吴江区）八圩镇，比我爷爷小10岁。他自幼聪颖好学，是“超级学霸”。中学毕业时，直接进入当时以理工闻名沪上的大同大学。在大学里，他以自身的优秀深得著名物理学家、教育家胡刚复和著

名化学家、教育家曹惠群等教授的器重。胡刚复恰好也是我爷爷的恩师。

1934年，杨承宗由曹惠群校长推荐，来到国立北平研究院镭学研究所。我爷爷是北平研究院物理研究所所长，兼任镭学研究所所长。爷爷安排杨承宗跟随郑大章先生，从事放射化学的学习和研究。

郑大章是举世闻名的女科学家玛丽·居里夫人亲授放射化学的唯一的中国学生，是第一位把放射化学带进中国的海归学者。爷爷安排杨承宗做郑大章的助手，不仅令刚学成回国、欲大展宏图的郑大章如虎添翼，也让大学毕业不久的杨承宗奠定了一生的学术事业基础。师生二人迅速投入到镭、铀、钍、钷等放射性元素的研究之中，很快就发表了好几篇有影响力的论文。

可是，天有不测风云。正当杨承宗跟着郑大章在放射化学领域潜心探索、成果频出时，却不料1935年7月一纸“何梅协定”，强令国民政府的军队退出北平。国民政府决定将故宫博物院、北平研究院、清华大学等重要文化教育机构迁移到相对安全的地方去。1936年初，我爷爷带着杨承宗赴上海实地考察，最终选定法租界的福开森路（今武康路）395号的一幢小楼作为镭学研究所新址。随后，爷爷特聘从英国获得博士学位回国的陆学善为专任研究员，到上海主持镭学所的工作。

郑大章、陆学善、杨承宗在战乱中



杨承宗（左二）在严济慈（右二）家中（图片由作者提供）

坚持放射化学研究，在异常困难的条件下不断做实验，他们在大量硝酸盐中分离出了很强的β放射源，写成了《关于β射线的散射》《β射线的吸收系数是β射线散射现象的实验基础》等论文。不幸的是，仅仅3年时间，1941年8月14日，郑大章在战乱和贫病中与世长辞，时年37岁。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日本侵略者开进了上海法租界。日本人知道镭学是当时的尖端科学，经常派人到镭学所监视检查，给研究工作带来了很大的麻烦。但杨承宗和同事们仍然坚守镭学所，不屈不挠，不懈地研究。1944年7月1日，一群人突然闯进镭学所，自称是汪伪政府教育部长褚民谊派来的，奉命接管

镭学所，限令陆学善、杨承宗三天之内清理完所有资产，交由他们管理。他们还软硬兼施要陆学善、杨承宗留下，继续镭学研究。然而，深明大义、铮铮傲骨的中国科学家，岂能与日伪奸共事！陆学善、杨承宗愤然拒绝，拂袖而去。

1944年7月7日，这是杨承宗永远忘不了的日子。这一天，他离开了自己在上海修建并坚守了8年的镭学研究所，回到苏州老家过起了寂寞清苦的日子。

1945年8月，日本战败投降。爷爷和吴有训等人受国民政府委派，到上海接收镭学研究所等被日伪强占的科学机构和财产。他们把陆学善、杨承宗等旧部召回上海，一同参加接收工作。杨承宗满怀喜悦投入到了镭学所工作的重建之中。

转过年来，1946年四五月间，杨承宗突然收到北平研究院转来的巴黎大学镭学研究所居里夫人实验室伊莱娜·约里奥-居里夫人（玛丽·居里夫人的女儿，人称小居里夫人）的信。信中说，她愿意接受杨承宗到居里夫人实验室学习，并为他申请了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的资助金。这对杨承宗来说，不啻天降喜讯。

1947年初，杨承宗就从上海登上了“香波里翁”号轮船，朝着向往已久的巴黎大学居里夫人实验室出发了。（作者系全国政协委员、九三学社中央委员会委员，严济慈之孙女）

我的第一部科幻小说诞生记

□ 星河

最近，我正计划出一套中短篇科幻小说集，共计100多篇100万字。所有作品都是正式刊发于各种报刊的科幻作品。发表于1996年的《决斗在网络》算是我比较有影响的一篇科幻小说，但这篇作品问世时我已经“从业”4年。第一篇作品《以刚胜柔》发表于1992年。

因为报社限制了字数，即便小说也只能是千字文，所以精心构思了一番，字斟句酌地写出来。那时没有电脑，所有稿件全凭手写——这种状态持续了几年。记得那段时间很多作家都在纠结是否换“笔”，而我却期望立刻用上电脑。

这是因为我的创作方式与很多作家不同，哪怕是一篇短文我也不喜欢从头写到尾，更愿意将所有资料堆积起来，然后摊开来一点点处理。我往往不是从开头而是从中

间甚至结尾写起，同时会反复修改，而电脑的各种功能显然对这种方式十分友好。

在尚无电脑时，我甚至会把写满句子的碎片片摆在床上拼来拼去。我曾就这种创作方式做过一个比喻：有人的写作方式是织布型——今天织三尺，明天织五米，每天都有可以告诉你他的工作进度；但我不行，我自命是雕塑型——先把一团材料堆在这里，然后一点点细化，今天能看出头部概貌，明天能看到五官显现，但是不到最后一刻，永远无法界定工作完成到了什么程度，永远不知道最终的成品是什么样。

那时对科幻文学的认识，还是严格局限于必须有一个超强的科学基础。所以在有限的篇幅里，除了铺陈小说的各种元素，还考虑到十分具体的科技可行性，令其在工程方面无懈可击。题目则脱胎于成语“以柔克

刚”，故意反其道而行之。

此前投稿不多，全都石沉大海，也未曾收到过什么退稿或通知。这次接到报社的一个长信封，敏感地意识到里面一定是样报。

后来又写了第二篇，类似的背景与科技，虽然没能再发，但还是被编辑找去约谈。那位编辑姓安，由于音序的关系，他的名字在我的电脑通讯录里一直名列前茅。

此后便一发不可收拾。虽说勤奋，但也贪玩，所以长篇寥寥。为数不多的几部科幻长篇也都出自少儿社，其实有些未必适于少儿读者。在出与不出之间也是反复纠结——想要有所表达，但语言与思想又受到一定的局限。

在我的科幻小说中，还是中短篇写得较多。当时刊载科幻的杂志很少，大多属于科普刊物，是以篇幅都有限制。惟一的专业科幻杂志《科幻世界》可以宽限到两

万字，此外我在《知识就是力量》主持科幻专栏那段时间也给了我很大的自由创作空间。

总之，这么多年，基本上就是单纯依靠文学创作，维持生计，图谋发展，从温饱走向小康，满足了所有的物质与精神需求，一步步走过了人生几十年的时光。

蓦然回首，《以刚胜柔》处女作发表于1992年2月24日——所以眼下，正值我从事科幻创作30周年。

（作者系北京作家协会专业作家，主要从事科幻与科普创作）

